

中美地方综合年鉴的 语类差异比较研究

陈 敏^{*}

摘 要 本文以语类理论为基础，通过选取中美地方综合年鉴的平行栏目的两组对等语篇进行比较分析，分别得出其语篇结构及语类结构潜势公式，提取其必要成分及可选成分，并探究制度惯例与意识形态这两个文化语境因素如何影响语篇的语类差异。

关键词 年鉴 语类 比较研究

一、研究目的与方法

作为《闵行年鉴》的编辑，我们对国内地方综合年鉴固有的编纂模式和语言特征几乎早已习以为常，不过有时也会产生好奇：世界上所有的年鉴都有共性吗？外国年鉴也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吗？如果两者有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然而，能查到的中外年鉴比较及研究的文献相对不多。而且其研究角度似乎基本以编辑、出版学为主，而不是语言学。其原因可能是：年鉴编辑很少是外语专业的（尤其是语言学方向），而且外语专业人员很少从事年鉴编辑，于是造成这两个学术领域的绝缘现象。随着对比语言学的兴起，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对比的手段也逐渐增多。从早期从事语音和语法结构的比较，着眼于某些语言特征的差异，逐渐扩大到语言的各个层级，甚至跳出语言层次，从更高的语域、语类及社会文化意义系统层面进行语言的异同比较，这方面的研究日益成为不同领域学者的兴趣点。

本文拟以语言学理论（本文主要涉及其中的语类理论）为基础进行中美年鉴比较分析，旨在观察中美地方综合年鉴以相同语类输出对等信息时发生相似或差异情况的程度，并探析原因。我们希望藉此丰富年鉴研究的方法，同时检验相关语言学理论的说服力和适用性；我们希望这种分析有参考价值，能把更多人引入跨学科的中外年鉴比较研

^{*} 陈敏，男，上海市人，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科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年鉴比较研究。

究领域。

本文使用的语料有4种、共6本:《德克萨斯州年鉴(2014—2015)》^①(以下简称《德州年鉴》)、《佛罗里达州年鉴(2002—2003)》^②(以下简称《佛州年鉴》)、《上海年鉴(2013)》^③(以下简称《上海年鉴》)、《上海年鉴(2011)》^④(以下简称《上海年鉴》)、《闵行年鉴(2013)》^⑤(以下简称《闵行年鉴》)、《闵行年鉴(2011)》^⑥(以下简称《闵行年鉴》)。我们抽取《德州年鉴》《佛州年鉴》《上海年鉴》《闵行年鉴》的“人口普查”(栏目)专文组成“人口普查”语篇;抽取《德州年鉴》《佛州年鉴》《上海年鉴》《闵行年鉴》的“犯罪”或“公安”栏目的概况及部分条目组成“犯罪/公安”语篇。两组语篇均选自中美地方综合年鉴的平行栏目,从对比语言学的标准来说,它们有高度的对等性,具有可比性。我们将分别展现两组语篇的语篇结构及语类结构潜势公式,提取其必要成分及可选成分,并探究制度惯例与意识形态这两个因素如何影响语篇的语类差异。

二、中美年鉴语篇语类比较分析

在研究语类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哈桑(R. Hasan)和澳大利亚学者马丁(J. R. Martin)。他们都是从语言功能的角度确立语类的宏观结构。哈桑的语类理论^⑦有两个关键概念:一是语境构型,指实现语场、语旨、语式的一组具体的值;二是语类结构潜势,即包含某一语类所有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的结构表达式,其结构遵循一定的次序。马丁把语类定义为一个作者带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来参与的、分阶段的、有目标导向的社会过程,他用纲要式结构来表示语类的阶段结构。

比较哈桑和马丁的方法,我们发现前者更适用于本文所选语篇的语类结构分析。同时,我们也采纳马丁的观点^⑧,即语类处于高于语域的语言层面,受文化语境(如制度惯例、意识形态)的制约。我们综合两家之说,因为这更有利于本文的分析研究。

(一)“人口普查”语篇

“人口普查”语篇的语境构型可概括为:

语场:人口普查报告;当地人口数据。

① Alvarez, E. C., *Texas Almanac 2014 - 2015*, Texas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14.

② Marth, D. & Marth, M. J., *Florida Almanac 2002 - 2003*, Pelic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③ 《上海年鉴》编纂委员会:《上海年鉴(2013)》,《上海年鉴》编辑部,2013年。

④ 《上海年鉴》编纂委员会:《上海年鉴(2011)》,《上海年鉴》编辑部,2011年。

⑤ 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闵行年鉴(2013)》,学林出版社,2013年。

⑥ 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闵行年鉴(2011)》,学林出版社,2011年。

⑦ [英]韩礼德、[英]韩茹凯:《语言、语境和语篇: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语言面面观》,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⑧ [澳]马丁著,王振华编:《语类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语旨：权威部门与普通读者。

语式：官方书面语。

我们分别用语境构型1、语境构型2代表英、汉语篇，它们可视为语境构型的两个变体。我们使用文字标签表示语篇结构，相邻结构成分之间以“^”连接。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大大简化语类结构潜势公式，只显示必要成分，不使用“（ ）”显示可选成分（但会另作说明），以避免冗长和繁琐；不过仍将使用“[]”表示一组成分作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并使用“·”表示其两旁的成分是可以互换的。

首先，分析英语语篇，《德州年鉴》的语篇结构大致为：

州人口^近两年的人口变化^人口数及变化率在全国的排名^各县人口变化^近十年人口变化在全国的排名^人口增长原因^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及比例^人口剧增地区^人口数据在全国的纪录榜。

《佛州年鉴》的语篇结构大致为：

州人口^近十年的人口变化^人口数及变化率在全国的排名^各县人口变化^人口中心地区^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及比例^人口数据在全国的纪录榜^儿童人口增长及原因^平均年龄变化^人口密度。

《德州年鉴》和《佛州年鉴》的语篇结构很相似，除完全一致的成分，其他如“人口剧增地区”类似于“人口中心地区”；两者都有人口增长原因分析，只不过后者聚焦于儿童人口。

语境构型1的语类结构潜势可大致概括为：

州人口^人口变化^人口数及变化率在全国的排名^各县人口变化^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及比例^人口数据在全国的纪录榜。

接下来分析汉语语篇，《上海年鉴*》的语篇结构大致为：

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全市人口^近十年的人口变化^外来人口变化及原因^家庭户变化及原因^性别比变化及原因^劳动人口变化及原因^少数民族人口变化及原因^文化程度变化及原因^人口扩散分布及原因。

《闵行年鉴*》的语篇结构大致为：

人口普查的背景^全区人口^近十年的人口变化^外来人口变化^家庭户变化^性别比变化^年龄构成变化^少数民族人口变化^文化程度变化^人口地区分布。

《上海年鉴*》和《闵行年鉴*》也很相似，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几乎对每项人口成分指数变化都有原因分析。

语境构型2的语类结构潜势可大致概括为：

当地人口^近十年的人口变化^外来人口变化^家庭户变化^性别比变化^少数民族人口变化^文化程度变化^人口分布。

最后，语境构型的语类结构潜势可简示为：

当地人口^人口变化^少数族裔或民族人口变化。

以上3个标签可视为人口普查报告这个语境构型的必要成分，其他在语境构型1或

语境构型2中出现的标签可视作可选成分,它们与不同的文化语境有潜在的关联。不同媒体刊载的人口普查报告通过严格保留必要成分,同时自由利用可选成分以保持自身的语篇结构特征。

通过比较语境构型1和语境构型2,我们发现两个显著差别:第一,是语境构型1重视“人口数及变化率在全国的排名”及“人口数据在全国的纪录榜”,考虑到中美政体的差异,这一点多少出人意料。也就是说,作为中央政府的地方年鉴的语境构型2似乎要比作为联邦政府的州年鉴的语境构型1更有可能关注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为什么中国的市(区)年鉴反而不关注它们与全国的数据比较?这方面的思考耐人寻味。第二,语境构型2强调一些语境构型1没有收录的人口结构,比如“外来人口变化”和“文化程度变化”,这可能是由它们不同的地区情况所造成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美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迁移在各个地区层面都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总体来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差距的。上海素以吸纳国内外的外来人才及务工人员而著称;同样,作为连接市区和远郊的近郊区,闵行区经历着大规模的、持续的人口导入,以至其流动人口早已超过户籍人口。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外来人口变化”成为语境构型2的一个必要成分。此外,两者都侧重人口质量胜于人口数量,所以“文化程度变化”也被考虑在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区情导致不同的关注点,于是产生语类结构潜势中不同的成分。

哈桑指出,“在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中,说话、存在和行为的方式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无论恰当的含义范围还是重要情景的变量组合值都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某个特定的情景语境,即语境构型,只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才有意义。”^①这就使得两个语篇有可能属于同一语类,却可以选择不同的语境变量。也就是说,由于文化语境不同,相同的语类可以通过语类结构潜势的可选成分产生一些语类差异。制度惯例和意识形态可以作为文化语境的两个参数,其中制度惯例一般指一个群体或社会长期形成的体制习俗。比如宗教、法律体系、教育、家庭等。^②对于“人口普查”语篇,区情因素就可以归入制度惯例的范畴。

(二)“犯罪/公安”语篇

“犯罪/公安”语篇的语境构型可概括为:

语场:当地犯罪、公共治安情况。

语旨:权威部门与普通读者。

语式:官方书面语。

我们仍分别用语境构型1、语境构型2代表英、汉语篇,它们可视作语境构型的两个变体。

首先,分析英语语篇,《德州年鉴》的语篇结构大致为:

① [英] 韩礼德、[英] 韩茹凯:《语言、语境和语篇: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语言面面观》,第101页。

② 赵虹:《语类、语境与新闻话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5、177、230页。

当地犯罪量及与上年相比的变化率⁶暴力及财物犯罪变化率⁷财物失窃及追回总值⁸拘捕成年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与变化率⁹德州执法部门加入国家统一犯罪报告方案以收集数据。

《佛州年鉴》的语篇结构大致为：

佛州执法部门长期收集犯罪数据¹⁰当地犯罪量及与十年前相比的变化率¹¹暴力及非暴力犯罪的分类¹²家庭暴力重新引起警方重视。

《德州年鉴》和《上海年鉴》的语篇结构相似，尽管前者涉及更细化的犯罪分类，而后者关注新的犯罪趋势。值得注意的是，除一笔带过当地执法部门收集犯罪数据外，两者都未记录为预防及侦查犯罪行为所采取的各类行动和所尽的努力，更别提警方所获得的荣誉，这一点和下面即将讨论的汉语语篇截然不同。

语境构型 1 的语类结构潜势可大致概括为：

当地犯罪量及变化率¹³当地执法部门收集犯罪数据。

接下来就分析汉语语篇，《上海年鉴》的语篇结构大致为：

上海公安机关年度工作概略¹⁴接报警电话次数¹⁵立案、破获刑事案件（含暴力犯罪）数及变化率¹⁶查处犯罪嫌疑人人数及变化率¹⁷受理、破获经济案件数¹⁸追回经济损失总值¹⁹公安工作的重要措施、行动、事件和成效等²⁰警方的集体及个人荣誉。

《闵行年鉴》的语篇结构大致为：

公安闵行分局各业务部门及派出所²¹民警人数²²警方的集体及个人荣誉²³闵行公安机关年度工作概略²⁴犯罪量²⁵侦破刑事案件数及变化率²⁶拘留、查处犯罪嫌疑人人数及变化率²⁷公安工作的重要措施、行动、事件和成效等。

尽管表面上有些差别，比如《上海年鉴》记录“追回经济损失总值”，《闵行年鉴》列出“各业务部门及派出所”名称，但两者还是同大于异，因为它们不约而同地收录年度“公安工作的重要措施、行动、事件和成效等”，再加上“警方的集体及个人荣誉”，虽然前后顺序可以不一。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两者还是相同性质的。

语境构型 2 的语类结构潜势可大致概括为：

[当地公安机关年度工作概略²⁸破获刑事案件数及变化率²⁹查处犯罪嫌疑人人数及变化率³⁰公安工作的重要措施、行动、事件和成效等]³¹·警方的集体及个人荣誉。

最后，语境构型的语类结构潜势可简示为：

当地犯罪量及变化率³²警方采取的行动。

以上两个标签可视为年鉴中的犯罪或公安情况记载这个语境构型的必要成分，其他在语境构型 1 或语境构型 2 中出现的标签可视为可选成分，它们与不同的文化语境有潜在的关联。一个语篇只有包含所有的必要成分才能归入一个特定的语类，而可选成分使某个语类的结构资源变得丰富多样。

通过语境构型 1 和语境构型 2 的比较，一些最显著的区别显现出来：语境构型 2 以大量篇幅不遗余力地记载“公安工作的重要措施、行动、事件和成效等”。例如新的工作机制、新设机构、典型案例等，并且收录“警方的集体及个人荣誉”，而这些在语境

构型1里几乎找不到。

上文曾经分析过,“人口普查”语篇的语类结构变化是由不同的区情引起的,但在“犯罪/公安”语篇中,语类差异和制度惯例的因素没多大关系,虽说不同地区的犯罪或公安情况也与不同的制度惯例存在关联。到底是什么造成语境构型1和语境构型2对可选成分的不同使用呢?我们试图通过观察“人”——年鉴编辑,来寻找可能的答案。

简单来说,尽管英、汉语篇的撰稿人多为政府工作人员,但是它们的编辑却不同:前者是非政府性的,《德州年鉴》是由北德克萨斯州大学的德州历史协会编辑出版的,《佛州年鉴》是由Pelican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而《上海年鉴》《闵行年鉴》分别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它们的编辑和撰稿员一样都是政府性的员工。在此情况下,语境构型1以市场为导向(或以大众为导向),因为它只记录当地基本的犯罪情况,几乎不提警方所采取的各类行动,尽管这些行动肯定是发生过的,但普通读者对此不甚关心。相反,语境构型2以政府为导向,因为除当地犯罪情况简介,还不惜篇幅罗列警方的各类措施、行动、事件和成效等。这一点可以由年鉴的发行范围和潜在读者群得到佐证。《德州年鉴》《佛州年鉴》流向大众图书市场,面向普通读者;而《上海年鉴》《闵行年鉴》大多数由政府部门办公室或档案室保存,面向政府工作人员。因此,前者必须具备市场意识,而后者会记载政府机关所做的工作及所获的荣誉。

这种造成语类差异的与“人”有关的因素可以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马丁把意识形态看作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参数。他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映射文化的社会个体的编码倾向系统,渗透于语境化语言的各个层面。通过语域变量实现,这些变量与人们不同的年龄辈分、性别、种族、能力和社会等级相关。也就是说,编码倾向的差别由个人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权力、控制关系所制约。即由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并决定个体接触和控制语类等符号资本的机会。这种编码倾向使得人们能恰如其分地选择使用语类、语域和语言的资源选项。因此,意识形态贯穿社会语境的整个语言体系,区分社会主体在权力、控制力、身份地位、权威性、声望方面的级别。^①

正如汤普森(G. Thompson)所提到的,社会文化因素或身份地位可以影响或决定我们想要通过语言做什么事,从而通过语言说哪些话。^②在“犯罪/公安”语篇中,不同的年鉴编辑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身份地位,因而产生语类的差异。

三、主要结论及意义

通过比较分析“人口普查”语篇和“犯罪/公安”语篇,发现其共同点为:“人口普查”语篇、“犯罪/公安”语篇所属语境构型的语类结构潜势可分别简示为“当地人口数~人口变化~少数民族或民族人口变化”和“当地犯罪量及变化率~警方采取的行动”,

① [澳] 马丁、[澳] 罗斯:《语类关系与文化映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第17~19页。

② [英] 汤普森:《功能语法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这些可视为其特定语类的必要成分。其不同点为：第一，“人口普查”语篇的语类差异主要受制度惯例（即当地区情）的影响，体现在美国年鉴收录“全国统计数据”，而中国年鉴收录“外来人口变化”和“文化程度变化”，这些可视为其语类的可选成分。第二，“犯罪/公安”语篇的语类差异主要受意识形态（即年鉴编辑的社会文化身份地位）的影响，体现在中国年鉴详细罗列警方的各种措施、行动、事件、成效，甚至所获得的荣誉，而美国年鉴几乎一笔带过。

本文尝试沟通年鉴学和语言学，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首次将年鉴引入语言学研究领域，拓宽该领域的研究对象和语料。正如马丁强调的，我们要以语言学为基础，从社会符号学角度把世界看作信息系统，把社会活动惯例看作语类，与人文、社会、自然各学科展开建设性对话。语言学家已经从这种对话中获取良多，但还有更多需要汲取，他们对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引以为荣。^①另一方面，把语言学这一实用、有效的分析工具引入年鉴研究领域，使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多元化。诚如许家康所言，为构建年鉴学学科体系，年鉴理论研究应当实现两个转向，其中一个就是从单纯的年鉴编纂理论研究转向多学科综合研究，特别是要加强与年鉴学相关、相近的学科如编辑学、出版学、新闻学、传播学、写作学、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方志学、统计学、图书情报学等的研究，为年鉴学的建设夯实基础。^②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这种语篇比较分析，中美年鉴或可尝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具体来说，在“人口普查”语篇中，美国年鉴收录“人口数及变化率在全国的排名”及“人口数据在全国的纪录榜”，当地人口状况的横向比较在各州及全国层面定位铺开，有比较方显特色，既让读者一目了然，又增加可读性、资料性。例如，“两年来，德州的人口增长率约为3.6%，总体上超过美国1.7%的人口增长率……2000年—2010年，德州的人口绝对增长量位列各州第一，增长率列第三，仅次于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③；“只有6个州的人口增长率比佛州高，不过它们的人口数要远少于佛州，从人口绝对增长量来看，佛州在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州中排名第三……佛州人口中的外来移民比例占18.3%，排在全国第三，仅次于加州、纽约州。”^④反观中国年鉴，其人口普查报告没有横向比较，资料各记各的，看不到同级行政区域之间以及与全国（市）的数据比较和定位，多少让人有“见木不见林”的感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很好地勾勒、反映区情特色。此外，通过“犯罪/公安”语篇的对比研究，中国年鉴不妨借鉴美国年鉴，适当转换社会文化身份视角，从政府导向朝市场导向（或大众导向）的方向略作调整或倾斜，尽可能地消除部门工作总结体的印迹。比如大幅度减少罗列公安工作的重要措施、行动、事件和成效，甚至所获的荣誉，而把重心转移到记载、剖析当地犯罪情况本身的资料、特点和趋势上（如果各方面允许），以增强内容深度和可读性。当然，美

① [澳] 马丁、[澳] 罗斯：《语类关系与文化映射》，第260~261页。

② 许家康：《祝贺和希望》，《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

③ Alvarez, E. C., *Texas Almanac 2014-2015*, Texas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14, p. 415.

④ Marth, D. & Marth, M. J., *Florida Almanac 2002-2003*, Pelic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p. 286.

国年鉴并非尽善，在语言方面也有不及中国年鉴之处，我们在另外的研究中已有发现，此处不展开。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语料库是小规模的，切入点是微观的，而且所选语篇仅是全书的一小部分，语类也仅限于两种，所以有片面性。其次，研究宽度不够全面，如舍弃一些符号以简化语类结构潜势公式；而对于影响语类差异的文化语境，只考察制度惯例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因素。最后，由于本文可能是目前国内外首个（据 CNKI、PROQUEST 数据库）比较分析中美年鉴语类差异的研究，限于能力和时间，不足之处难免，还望方家、同行不吝教正。

责任编辑：冷晓玲 范锐超

《中国电影年鉴》

出版日期：1934 年

出版发行：南京正中书局

《中国电影年鉴》是中国第一部官方的电影年鉴。这本年鉴的出版和出现，正式开创了官修年鉴和官修电影史的它分为：理论研究、史实编纂、行政管理和商业概况四个大的部分，选入的文章为学术论文和专业译文两大类；在体例和构架上，它正式确立了电影史论、创作理论、电影管理和电影教育的四个学术研究构架，奠定了中国现代电影研究的学科分类和方向分类，使得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在学术上基本成型和梳理清晰；在内容上，它编入了关于我国及各国电影的历史、理论、电影教育的历史以及运用电影实施教育的历史和发展过程的实录，还有当时全国所有制片公司、各大影院、电影从业人员的名录，及 1932 年至 1933 年国产片和进口影片的详尽片目与分类记载；在类别上，它从电影史论、电影政策、电影机构、电影教育等共十个板块对电影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和论述。这本官修的电影年鉴在内容上并不局限于 1934 年这一年中对于中国电影史实的记载，实际上是当时的一部关于电影的百科辞典。

《全国银行年鉴（1934—1937）》

出版日期：1937 年

出版者：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

全书分为最近三年银行大事述略、全国银行总览、各地银行调查、银行公会、银行法规、银行统计、银行人名录、银行日志、外商银行、钱库与银号、信托公司、银公司、储蓄会、典当 14 章。